

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5.05.003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姚亮.当代文学终极关怀书写的典范:论何士光修证实践系列散文[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4):185-194. 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5.05.003.



Citation Format: YAO Liang. A model of writing on ultimate concer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On He Shiguang's series of essays on religious practices[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5(4): 185-194.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5.05.003.

当代文学终极关怀书写的典范: 论何士光修证实践系列散文

姚 亮

(深圳技术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118)

摘要:当代文学中超验维度的阙如和终极关怀视野的悬置是一个普遍而持久的顽疾,评论家多有指陈,作家也深有体认,然而在作品中的表现总是不尽如人意,离读者的期待还有遥远的距离。除了外在环境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写作者自身的思想穿透力不足,常在经验的畛域中逡巡不前。这种现象的产生应该与作家们的思想资源取舍紧密相关。与传统的隔膜,对元典的疏离,导致了思维能力的柔弱、视野的褊狭。何士光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突破者。他深入道、佛等传统文化,熏修实证,获得了终极关怀的视野和超验的智慧。他以此来重新审视自己与他人的生活与生命,写出了一系列自传性修证实践散文,为当代中国文学终极关怀书写示范了一条别样路径。在道、佛义理与体验为其赋予的终极关怀视野中,文学散发出亲切的气息和智慧的光芒,不但带给人现实的慰藉,而且唤醒人心中对永恒的渴望。无论是叙事动机的检视、作品结构与写作技巧的安排,还是对自己人生道路的省察,抑或对宇宙人生的系统反思,都被置于终极关怀的坐标中,各自获得了恰当的位置,每一个事物和细节都呈现出自己应有的价值与意义。比如,在终极关怀的视野中,他对同性恋、性与爱的关系、《红楼梦》批评等提出了全新的解释。因此,这些作品不仅给人创作上的启发,同样带来心灵的抚慰与智慧的启迪。此外,何士光作为个案对当下浅阅读时代的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也有着示范作用,既让人看到了文化的效用,也展示了深入文化的路径和可行性。因此,他的修证实践系列散文不仅对文学创作有帮助,对文化发展有启发,还对技术主义冲击下的浅阅读和知识碎片化等时代病具有疗效。

关键词:何士光;终极关怀;修证实践;宗教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5)04-0185-10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9年度)一般课题“何士光文学创作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姚亮,博士,深圳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Email:314096314@qq.com。

在当代作家中何士光绝对是个不容忽视的异数。遗憾的是,当前的文学史对他的介绍实在有限。当代文学在技巧上的成绩是很明显的,评论家反复指陈的主要痼疾是超验维度缺席和终极关怀视野匮乏导致的意义稀薄与价值坍塌,而何士光是少数克服了这一弊病的作家之一。何士光曾担任贵州省作协主席,主要著作有《何士光文集》七卷,其中《烦恼与菩提》《今生:经受与寻找》《今生:吾谁与归》等修证实践系列散文即是集中反映他在终极关怀书写方面成就的代表作。在这些自传性作品中,何士光直面生命的烦难,秉持大无畏的精神“以身试法”,试图为生命开拓一条出路。无论命意用心还是文字技巧,都属上乘之作,堪称当代文学终极关怀书写的典范。

一、终极关怀书写的研究价值

“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是对人生的终极意义和终极价值的关怀,提出这个术语的哲学家蒂利希认为“人最终关切的,是自己存在及意义”^[1],也就是对人之为人的全部生存价值和意义的关怀。他的论述路径是基督教哲学。张岱年认为,古今中外有三种类型的终极关怀:“归依上帝的终极关怀,返归本原的终极关怀,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2]他把佛教与归依上帝都划入“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终极关怀”,把道家划入“返归本原的终极关怀”。张岱年主要是从哲学层面进行分类,实际上,从宗教的角度,佛教、道教和归依上帝都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终极关怀。何士光的修证实践是对佛、道的实践,也就是说他选择的是宗教路径的终极关怀,但他在写作中并不专断、偏激,而是尽可能地持守中道,将佛、道的理论与修证体验和科学研究的结论放在一起比较论述,努力沟通二者,让读者看到它们在本质层面并不冲突,且有很多相通之处;同时,他也指出主要的沟通障碍在于话语体系的隔阂、唯科学论偏见以及对佛、道义理和实践缺乏了解。在讲述方式上,他注重从生活的细节、场景切入,把个人的生命历程带入,让佛、道的义理和修证的体验亲切而有人情味,令人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对人的关怀,以及念兹在兹的终极眷注。当他从终极关怀视野反观和省思生命与生活的时候,处处闪现着洞见和启发,引人深思。如论者指出“从他浓淡相宜的抒情方式和娓娓道来的宗教宣讲中,每一个读者无不感受到一种尘土拂面般的悲悯和温暖,同时也势必会给这个信仰危机、文化危机的时代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激发更深的困惑及更独特的思考”^[3]。

何士光自写作事业的巅峰急流勇退,艰难地从二十世纪诸多劫难后的残砖断瓦中寻觅道、佛的消息与法门,叩问生命的究竟和人生的意义,终于苦尽甘来进入生命的开阔境界,获得了法乐充满的终极关怀视野。当他从这个顶峰回望自己的人生以及芸芸众生,心中充满了感慨与悲悯,因而有了这一系列自传性修证实践散文,既是总结,也是传道。何士光无意中接续了中国文学史中说唱文学一脉的精神,造就了二十一世纪的“俗讲”与“变文”。虚云法师曾言:“若得理益,证实相般若;若得事益,证文字般若。”^[4]何士光无论在理还是事上所证得的“般若”均非一般,值得我们认真面对。

二、以终极关怀为轴心的书写

何士光自幼敏感而聪慧,这一点从他叙述儿时的故事可见端倪^[5]。这一禀赋在创作中得到了极好的发挥,他的小说《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远行》分别获1980年、1982年、1985年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据他说,后来还有两部作品也入围最终名单,但是主评委跟他说再颁给他没必要了,把名额让给别人。这些作品都是对尚处于“青萍之末”的时代风潮的敏锐捕捉,颇具慧眼和悟性。《乡场上》发表于1980年,写惯于看人眼色仰人鼻息的冯幺爸挺身为受欺负的妇人作证,这个转

变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民有了土地可以自食其力,不用再依附于人求生活,从而获得人格独立。《种包谷的老人》发表于1982年,主人公刘三老汉辛勤耕种分到的土地,在孤独寂寞中精心侍弄每一棵包谷,他有两桩心事,要偿还艰难岁月欠下的债以全信用,还要为女儿补办一份嫁妆以弥补心中的亏欠。等丰收来临的时候,老人离开了人世,然而“一点也不象病了,不过是安歇了,仿佛他已经做完应该做的事情,可以落心地歇下来,于是在蓝色的夜里宽余地睡过去”,这暗示着老人心愿已了的满足。这篇小说主要用意突出农民自主性被激发,农业生产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人在劳动中获得了尊严和自足。《远行》发表于1985年,通过一辆进城的破旧客车上的冲突写出社会转型期新旧秩序的交锋,权力、新贵、普罗大众在新的经济浪潮裹挟中上演了一幕对秩序的挑战与重塑的“活剧”。这场冲突与混乱表现了发展中的问题,作者从山乡的一个场景来透视整个中国大地的剧烈变动。这三个短篇实际上组成了一个三部曲,折射出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叶中国社会改革带来的变化,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制度层面都得到了细致的关照。而每一部小说刚发表就获得当年的中短篇小说奖,可见他对时代风气的观察与体会何等深入,从中不难推知作者的敏感与聪慧非同一般。

何士光读大学期间被蓄意构陷获罪,毕业后放逐僻地,在远离县城八十里、距贵阳两天车程的瑯川戴罪改造,八十年代初,年届不惑才凭借写作的成绩回到省城。这些苦难对于一个敏感而聪慧的人而言,在心理上的影响较一般人要更为深刻。写作曾支撑他度过漫长而孤独的艰难岁月,安慰他天生敏感的心灵,他写道:“于是我只有依靠阅读和写作,来把一个个的夜晚度过去。”^{[6]33}不仅如此,写作也带给他世俗的成就与荣耀,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因此,在创作的盛年与职业的巅峰急流勇退,选择在荒烟蔓草中辨识那条踪迹杳渺的通往生命奥秘的小径,无论如何是令人费解的。而这种费解与他的决绝正好凸显了这一条与世俗显达之路迥异的小径非比寻常,它虽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却又着实攸关性命。古往今来多少智慧的头脑曾缘这条秘径上下求索,留下了很多玄秘幽远的故事,透露着彼岸世界的消息。作为一个有限性的存在,人或多或少都有窥探那个世界的欲望,然而常被各种现实的境况所羁縻,要么浅尝辄止,要么引颈遥望,鲜有人深入其堂奥,一窥究竟。现代人更是如此,紧紧被资本、欲望、技术、快节奏以及唯科学论的喧嚣裹挟,更难抽刀断水、急流勇退。因此,何士光的自传性书写首先宣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立场,即从工业化浪潮的裹挟中跳出,重新掌控自己的独立和自由,主宰自己的人生和生命,最核心的表现便是独立运用自由的思想,去求解生命的秘密,这是终极关怀的起点——对人的关注,对生命的聚焦,把生命的归宿当作头等大事去解决。对人的强调与关注是中国新文学从肇始之时便念兹在兹的要义,虽然常常“不能至”,但仍然“向往之”。这种对人的肯定与标举是新旧文学的基本分野,经过新文学初期理论家周作人的三篇建设性文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圣书与中国文学》的阐扬,这一理念更加清晰和具体并且被赋予了一定程度的可操作性。在新文学的百年历史进程中,由于时代主题、社会变革、政治风潮、作家才具等因素的影响,对人的关注经常被淹没或者搁置,尽管如此,仍然时有回响。只不过,由于缺乏持续性深入开掘,其深度和广度自然难免受影响,而何士光在克服这一缺陷上为同行们作出了示范性贡献。

有了这样的念头和立场之后,并不必然能保证结果的可预期性。何士光在写作中一再强调“机缘”,虽然从后见之明的角度很容易将其理解成受当年传统文化热的影响,但从他的人生历程与命运遭逢考察却会倾向于何士光自己的立论。很多人都曾躬逢那次传统文化热,然而因此毅然决然

放弃事业走向修证的却少见。机缘从佛教的角度表示曾经种下的因开始发生作用,而何士光刚好赶上20世纪80年代的传统文化热,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并且没有浅尝辄止,自然不能说他的解释有错。他曾在演讲中说,上学的时候遇到各种运动没有时间读书,流放的时候地处蛮荒无甚书读,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书却泛滥到了阅读不完的地步,因此张贤亮送他的《真气运行法》高卧书架一年多也没引起他翻阅的兴趣,而第二年新春的某个夜晚他却自然地拿起来读了,并从此走上修证之路。“就在这样的平平常常和不知不觉之中,你所负载着的因果就在牵引着你的心思,然后让你一步一步地,朝着结果走过去。”^{[7]29}所以,“机缘”意味着内因和外缘的结合恰到好处,从而对现实生活产生实际的影响。从作者的自述中,他多年以后回望当初的选择,机缘、因果昭然若揭,恰如李白诗云:“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类似的“偶然”事件很多,当作者在终极关怀视野中将这“偶然”串联起来,必然(因果)便浮出水面,历历可指,叫人无可推诿。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作品中作家确实是在终极关怀视野的烛照下来审视和省思自己的生命历程,这是其修证实践系列散文的起点与归宿,也是这些作品作为当代文学终极关怀书写典范之关键所在——终极关怀在在处处成为他书写的轴心。有研究者注意到“他的生命之旅一直在自己的佛教视野的掌控之中”^[8],所写之事均由此辐射开去,因此,种种经验便被赋予超验性意味,而这些经验所组成的作者的人生便被纳入终极价值坐标,意义由此建立,人生的任何苦难于此全然得以解释和慰藉。这是终极关怀不可或缺的根由——它为人生赋予了价值和意义得以生成的坐标体系,将一地鸡毛的日常和浮世人生的悲欢凝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让人生在世获得一种系统性、整全性的关照,克服生命的碎片化与暂时性带来的虚无感,令生命得以安顿。

“机缘”是何士光在终极关怀视野中找到的叙事的逻辑起点。他当然清楚,有人可能对他强调的“机缘”持怀疑态度,不仅如此,对于他自己而言,他也必须确证这个寻找生命奥秘的动机是必要的、内在的。因此,在这些修证实践散文中他时时提及,无论对于论述的展开还是对于修证之必要性而言,都是不容含糊其辞的,这首先对于他自己尤其需要交代明白。“生命和生活的沉重、苦难和空幻,又仍然是人们无法不感受到的”,而“层出不穷的知识和见地,又还是不能为我们解开这生命的秘密,所以你活着,又始终还是活在生命和命运的这个谜里”^{[7]3}。因此,每个人但凡明白了这一点,都有一种冲动,希望解开生命的奥秘,摆脱苦难与哀愁,获取自由和幸福。这是“生命本身对自己的追逼”,“总得知道这生命的根柢是什么,才能知道怎样来交代自己的这个生命,然后又才能让自己一天天地把日子过下去”,否则,无论热爱还是厌弃生命,“又有什么最终的依据呢?”^{[7]104}作者自陈他之所以去寻求终极问题的答案,乃是一种生命本身的追逼,这是一种“生命固有的哀愁”^{[6]20},如果不能得到解决,“这活着就不过是活着,最终就不会有什么意义”^{[9]27}。哪怕是在他生命中意义难以估量的写作,纵然曾经把他从流放的孤独和困苦中拯救出来,帮助他重回故乡省城并且带给他成就和荣誉,也不能令这份哀愁释然。所以,当他因写作获奖时,日记里却充满了忧郁、悲凉和忧伤^{[6]36-37}。不仅如此,他的写作愿望亦渐渐淡漠起来,因为他心里认定倘若不解开生命的谜,不过是在生老病死和悲欢聚散中沉沦辗转,生活毫无意义。因此,为了追寻生命的意义,他踏上了修证之旅。当年弘一法师、虚云法师等抛家舍业入山林大概也是被同样一份哀愁驱使。他们不是苟且偷生的弱者,而是敢于与命运肉搏以寻求生命之道的勇士。如同当年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在雅博渡口与上帝摔跤角力为获得祝福一样,雅各紧紧抓住上帝,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10]他们都是为了求取更丰盛的生命而不惜“以命相搏”的卓绝之士。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

人。”^[1]无论学问还是功业,一般人追求的是“为人”——炫耀给人看以博得虚名固然是“为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以换取实际利益也不算高层次的“为己”。而对生命有严肃期许的人,则是追求真正的“为己”——让自己的生命得到益处,不是名闻利养之益,乃是道德修养的提升甚至生命的整全与完善。那些选择修证之旅的人便是终极意义上的“为己”,何士光就是这个阵营的人。他在这些作品中所叙述的动机十分清楚,这个交代既便于读者理解他的故事,也给人一种现身说法的参照和启发。如果从世俗眼光去看何士光的选择,大概只能被当作异类或精神病;然而,将其放在终极关怀视野中去理解,逻辑自然,令人肃然起敬。他乃是在功业成就的百尺竿头之上更进一步,求取生命的真谛与答案,因而换了一种活法。

这一系列修证实践散文作品的结构安排也煞费苦心,都是从终极关怀视野的角度来选材、剪裁和叙述的。一方面,这种讲述方式是作者的经历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他的写作命意需要。他主要讲述自己的修证实践历程、对生命终极奥义的理解与体验以及对大众的规箴与劝喻。《今生:经受与寻找》采取了对照的结构来讲述,以邻家姑娘和“我”互为镜像,让二者的经历彼此映衬,两个几乎毫无关联与可比性的人在终极关怀视野中成为启发者与觉悟者——他们共同完成了一次终极意义的转换。邻家姑娘与作者住在一条巷子里,却从未说过话,她似乎连作者的存在都未觉察到,而作者却一直留意她的变化。儿时他觉得邻家姑娘会过上一种“美丽的生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愿望”被生活摧折得面目全非,姑娘在并不那么如意的生活中消磨了生命,青春逝去了,生命委顿了,沦落为拾荒者,最后莫知所踪。而这一切就像舞台上的折子戏,一出一出地展现在作者的面前,一个敏感而聪慧的人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他原想把一句佛号传递给她,以此帮助她引度她,不承想姑娘不知所终了,他有些失落乃至悲伤,后来他突然领悟:“我的这一点好意最后却不能当面传递给她,而事情刚好反过来,其实在这数十年的光阴里,她却是一直在无言地引度着我自己;我不能不说,在我今生今世的日子,一次又一次地,我正是从姑娘的身上,看见了生命的灵秀,但同时也是从她的身上,深味了生命的沉重、生活的苦难、人生的艰难;这就让我从中感受到,我们一旦活着,就不得不一再地去认识自己,然后才能凭借着这一天天来到眼前的生活,去为这人生找到最终的归依……我们是要靠众生来引度的。”^{[6]178-179}若是在日常生活视野中,作者大概是处在高位的同情者,邻家姑娘是处在低位的被同情者。正是在终极关怀视野中,这件事情的意义得到翻转:被同情者变为引度者,同情者变为被引度者,两个没有什么关联的人在生命的深处建立了宝贵的连接,如同作者所言:“我就常常在姑娘的生活中看见我自己的日子,也常常在自己的日子之中看见姑娘的日子。”^{[6]84}这种转换凸显了导致转换的背后依据——终极关怀视野,具体来说,在这个故事中是佛法所赋予的终极关怀视野。这种凸显乃是作者写作修证系列散文的命意之一——弘法利他。在佛法的视野中,他不仅让读者看到了这个翻转,还让人看到两个生命的各自安顿,无论迷者还是觉者,所处的境况都不是外力所决定的,而是由各自的业力、因果所牵引。姑娘的人生遭遇也就是她的因果所现,既然找到了原因,也就不难索解了,因此,作者的心结解开——“渐渐地便从三世因果之中,为邻家姑娘这默然而苦难的一生,找到了一种希望和祝福”^{[6]83}。

从终极关怀视野对人生进行透视与新文学高举“人的文学”是遥相呼应的。什么是“人的文学”?1918年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指出“人的文学”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文学。但他特别强调,他所说的“人道主义”绝非“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一类的慈善主义,也就是说不是一种高姿态的俯视众生,而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实际上这是一种高度自觉的状态,把个人放在众人之

中,既不失去个性,又强调人、我的相通,因此爱人就是爱己,并不存在俯视。这篇文章没有特别指出他的思想来源,而在1921年的《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则清晰地展示了他的“人道主义”源头,乃是圣书中一再强调的“合一”。人、我原是同出一体并且如同肢体一般彼此骨肉般关联着,如果觉知到这一点,“同体大悲”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了。那么,从他人看见自己,从自己推及他人,也是合情合理的。“文学是人学”——以文学的方式来关照人、启发人、感染人,令人更加“合一”,便得以可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周作人的立论也是从终极关怀视野展开的。他的思想来源是希伯来经典,与何士光所凭借的佛、道等中国文化有着惊人的默契。就如这个案例所展示的,终极关怀应该是所有文明的最高目的,纵然在表层的细节有各种差异,本质上却是相通的。即使从常识推测,人之为人也是同多于异的。所谓文明冲突不过是表象,甚至很多时候可能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特定目的而刻意夸张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提倡人与人合一、关注人本身更加必要而紧迫,终极关怀书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终极关怀视野中的洞见与启发

终极关怀为何如此重要?因为它关乎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之确立,为生命提供了一个彻底的解释参照。终极不过是根本,是本来,每个人的根柢,而非远在天边的玄虚。一旦对终极有所界定,那么相应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坐标就树立起来,因而种种苦乐都有了自己的位置,也因此而影响着人生的取舍。何士光所取的终极是佛教的界定,因此其价值和意义的参照系就是佛法。他自己的人生依循佛法的引导进行着,他的生命因此进入另一番景象,《今生:吾谁与归》和《今生:经受与寻找》两本精神传记比较详细地展示了这个过程。为了求解生命的谜,为自己的人生寻找根柢,他从写作事业的巅峰迈入修行者的行列,在世俗价值坐标中这个转变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且有矛盾和盾不相容的意味。然而,从终极的、超验的视野回望,二者毫无齟齬,内在的逻辑一以贯之。他写作也是为了从苦难中寻求支撑、寻求意义、寻求活下去的根据;后来走向道、佛的修证实践,不过是更直接地面对意义本身。当他跳出经验的藩篱,从终极的坐标反观人生所经历的种种,别有一番意蕴浮现出来,那是琐碎的生活细节在终极关怀视野中绽放的意义之花。这种超验直观的洞见带来的启发常常是醍醐灌顶式的,因为它从永恒来看人生,从整体来打量局部,并且拉开了足够的距离,从而更透彻、更周全、更有说服力。同时也说明,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从来就不是互不相干的,它们一定可以统一的,终极关怀必然包含现实关怀,而现实关怀有了终极关怀视野就有了根基,不会显得碎片、浮浅乃至虚幻。

进行修证实践之前的何士光经历了那个时代所带来的巨大苦难和心灵创伤,像一叶浮萍一样被时代的风浪击打播撒,其孤独、苦闷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他在修证中开悟以后,这一切苦难就消融了,他与生活不再对立:“由于这心里的自我散开了,我和生活之间的障碍也就消失了。我走在街市之中,街市也来到我的心里,我就感到自己和生活融合成了一体……”^[6]⁶⁷我们为什么会有痛苦?因为那些异己的外部力量让我们的精神和肉体不适。然而,当个体与世界的对立和界限消失以后,痛苦何有?这就是释迦牟尼曾经在证道时所示范的:“他便发现自己的心灵和世界融为了一体。一切阻隔都消失了,他自己就成了世界,世界就成了他自己。”^[9]⁴⁷当一个人与生活、与外部世界达成和解,精神上融为一体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找到了归宿,因此,何士光这样总结他的悟道:“有一句话便来到我的心里:我回家了。这时候离我哭啼不止地来到这个人世上,也已经有五十一

年的时间了。”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从此生活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不会的,生活依然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转,只是其中悟道之人的心境变了、体验也变了,因而生命状态也变了。好比收音机转换了接收波段,原来的噪音切换为美妙的音乐,生命的秘密大概仅此而已。终极关怀视野是从心上下功夫得来的,因此,一切正教都教导从心上转变,而不执着于环境的变化。获得了心灵的转化之后,仍然在原来的环境中生活,只不过体验完全不一样了,苦旅变成了归家,地狱化为天堂。很多人同何士光有着类似的遭遇,哪怕时过境迁,曾经的痛苦和怨毒仍然噩梦一般纠缠着他们,无法消化。这种“第二次伤害”比起当初遭逢时更具有毁灭性和腐蚀性,如果不能摆脱,心灵便在其中辗转煎熬,无有尽时。如何解脱?只有放下。但是,这种放下不是忽视,也不是压抑,而是真正从心上重新正视它,用更高的智慧和力量来消解它。南非种族大屠杀以后,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带领人们用忏悔与宽恕来促成种族之间的和解^[12],因此获诺贝尔和平奖。这种超越两极对立的智慧和力量来自图图大主教的基督教信仰,正是宗教赋予他的终极关怀带给了南非人民医治和安慰,让痛苦被消融,生活能够在和平中继续。正如印度哲学家克里希穆那提所说,宗教并不是逃避事实,宗教是对日常人际关系中的你的了解,宗教就是你演说的方式,你谈话的方式,你对仆人说话的方式,对待你妻子、孩子和邻居的方式。所以,宗教是一种智慧,是可以提供终极关怀视野关照当下、改变当下、直指人心的智慧。

经过修证实践的何士光在心性上完成了转换,能够跳出经验视野的限制,从终极关怀视野反观当下,因而在感受和体验上可以不被先前的痛苦所牵制,不仅如此,在眼前的生活中也获得了新的智慧和境界。比如关于持名念佛的理解,通常认为是为了本人的修行,他却领悟到了新的含义:“你所背负的这个‘自我’,不就是你的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因果关系的总和?所以你如果把自己从人们之中剥离出来,实际上就是做不到的。你如果要为自己念佛,其实也就是要为大家念佛。”^{[6]177}因为人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关系中存在,那么因果必然产生于关系中,个体无法从人群中剥离,总是与他人息息相关;因此,念佛转变自己,当然就改变了与他人的关系,从而也就影响到他人。这是从消极一方面理解,如果从积极方面理解,在为自己念佛的同时也为他人念佛,更会改变原来的关系并且惠及他人。这里面所体现出的人、我一体不仅仅是一种人道主义,更是一种终极智慧:所有的存在都是彼此关联的,因此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善待自己便是善待他人。佛家所谓“同体大悲”、基督教所谓“互为肢体”及“住在基督里”、儒家所谓“民胞物与”等都是大家司空见惯的说辞,在使用的时候往往也只是停留在义理和文字上,或者即使进一步也只是被这种所谓“人道主义”所感动,然而究竟为何如此却少有思考。何士光认为修道是回到原来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即我们经常说的摆脱“异化”,回到本来,也就是回到根本、究竟、终极。而从佛理上说,人和世界的关系就是同构的、互生的,甚至是同质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13]——一切存在不过是因缘际会,方生方死。当他跳出日常经验,从终极坐标俯瞰人生和世界的时候,同样的事件便闪现出新的意义。比如,“文化是对天地和人生的把握”^{[7]303},这是他从堂兄周娃子这个不识字的庄稼人身上得出的结论;比如,他从岳母身上看到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便是一个“家”字,这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人的心里,就像岳母一样,“由于她一直想成为一个称心如意的当家人,最后就成为了一个活在自己心中的当家人。这样的烙印,就使得她不能去开启和拥有更宽阔的生活,而扭曲和伤害了她的一生”^{[7]296}。这种极具穿透性的终极眼光不仅仅对外,更多的是对内——审视他自己,审视的目的不在于否定,而在于行动,这样才真正契合佛法的妙义。比如,之前的写作支撑他度过艰难岁月,后来发现写作是“不

了义”——“因为触及不到或者是不会触及这生命的真相和根柢”^{[7]38},等他觉悟之后,他明白文可以载“道”,就像《西游记》和《天路历程》一样。写作对于他的意义就不一样了,他再次拿起笔,以类似“俗讲”和“变文”的方式弘道,引度他人,于是就产生了这一系列修证实践散文。这些文章对一般作者的意义大概止于记录心路历程,而何士光更期待的是给人以亲近佛法、寻找生命真相的方便。所以,在他手里,文学从最初的个人爱好,到后来的独门济苦之舟,再到现在的弘法布道广开方便之门,一步一步回到它本来的位置,完全彰显了终极关怀的本质特征。再比如,他从终极关怀的角度看《红楼梦》,又有一番新意。很多人论述过《红楼梦》与佛学思想的关系,何士光则说得更透彻:“一个人开悟之际,也就是纠缠着的心思被拧断之际。这样的时刻,诚然是包含着某种危险的。心思都拧断了,弄得不好,这个人也就会成为神经病。贾宝玉也有些像这样,只一瞬间,就变得痴痴呆呆的。此后又延续了一段时间,也确乎像一个精神病人。但他既然是通灵宝玉,也就有相当的根器,到后来,好比散开了一天的阴霾,一颗心也就变得圆满而岑寂。这以后的贾宝玉就判若两个人了,没有了心里的那一份我执,便没有什么不能随顺的。要与宝姐姐完婚也可以,要去挣一份功名他也愿意。”^{[9]206}尤其是让宝玉去考功名这一章节历来为人诟病,甚至被当成背弃曹雪芹本意的铁证,因而后四十回通常被认为是伪作或者续书。但是佛法的终极视野启发何士光作出全新的解读,他认为这个安排恰恰是宝玉开悟的表现,因而更与全书的佛教意蕴相吻合。这一洞见也与《白先勇细说红楼梦》经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相一致,他认为曹雪芹写完了全本,只是后四十回没有时间打磨,因此不如前八十回精致,篇幅巨大,初稿中有龃龉之处实属正常。这是一个精通写作之人的诚恳平易的经验之谈,没有什么故弄玄虚之辞,却可能更加贴近事实本身。

在终极关怀视野的烛照中,何士光为读者提供的启发和新见远不止于此,再举两例经常被谈论的热点话题供参考。同性恋为人关注有多方面的原因,政治、宗教、道德、法律、身份、文化等因素掺杂其中,剪不断理还乱,十分棘手。导致这个局面的根本问题在于无法解释其成因。柏拉图在《会饮篇》里借人物之口说是人被天神劈开成两半,在重新组合中产生了同性恋^[14];基督教经典里则只说是因原罪所致,没有细说缘由;现代社会中很多人则认为它是一种精神疾病,于是斥为异类。无论是玄远悠谬的神话,还是粗疏的归罪,抑或是污名化的疾病指认,恐怕都难服众,因而莫衷一是。何士光从佛教的角度提出解释,认为人在多生多世的轮回中或为男或为女,因而本身就无所谓纯男纯女,只不过某种性别意识暂时性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已。“要是是一个男性的意识体落在了一具女性的身躯里,这个女子就会显得像一个男人一样,带着男人的种种习气;如果一个女性的意识体落在了男性的身躯里,这个男人也就会扭捏起来,显得像一个姑娘似的。”^{[9]199}从佛教的终极关怀视野来看,同性恋与异性恋一样,不过是一桩十分自然的事情,这样便从根本上斩断了各种分歧和聚讼,因而也就消除了不必要的痛苦与怨怼,更是阻止了歧视性偏见的生起。另一个颇有意思的观点则是关于性欲和情欲的。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认为性欲是情欲的基础。而何士光根据《道德经》“未知牝牡之合而媵作,精之至也”的教义,认为“从最本来的面目上说,生命所固有的这种亢奋的状态,就没有带着男女之合的欲望,也不是来自男女之情的吸引。它会自然地发动起来,也会自然地平复下去。所以性欲并不是情欲的基础,也不是我们的最根本的本性,我们的情欲、性欲和媵作,就是一些截然不同的事情。”^{[9]201}这是从道教的终极关怀视野中所得出的结论,着实让我们对之前的认知有新的思考和感悟。这一系列修证实践散文中包含着很多类似的例子,从终极关怀视野的角度对生活与人生的省察刷新着读者的认知,也带给阅读全新的趣味。

结语

何士光的自传性修证实践系列散文在当下的语境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首先,在一个碎片化浅阅读的时代,他示范了深入元典寻求智慧的道路。何士光是在文化热的影响下踏上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生命的答案之路的。他的经历和经验以及获得的智慧对于当代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精彩而生动的示范。实际上,不仅个人需要回到元典,整个社会也需要元典的启示与指引。哲学家怀特海指出,西方两千年的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注释。实际上,人类每一次思想创新,都是对轴心时代的回望和对元典的重新发现。在着力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儒、释、道等诸家元典是我们宝贵的思想资源,值得我们秉承敬意地温故从而能够知新。同时,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世界公民,我们的思想资源更加丰富,不仅有中国的传统可资借鉴,而且要努力践行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一切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都应成为我们的财富和宝藏,为我所用,化作我们通往幸福之路的资粮。

其次,何士光的写作给当代文学的终极关怀补上了相当完整的一课,并提供了一种典范性的文本。当代文学终极关怀视野的稀缺,导致创作难以突破瓶颈。作家们反复在社会问题与私人话题之间摆动,固然在技巧的借鉴和磨炼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却一直在经验的畛域里打转,无法突入超验思维从而获得终极关怀的视野。当代著名作家张炜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辛勤写作几十年,作品超过千万字,可是在那部获茅盾文学奖的集大成之作《你在高原》中,仍然只能在横向上左冲右突,无法在纵向上突破,作品缺乏超验的品质,显得笨重,读来令人疲惫。他所谓“高原”本该是虚灵的精神家园,却被坐实为一处海滨故地的葡萄园,所以主人公只能陷入“无边的游荡”,而无法实现真正地诗意栖居。究其根源,乃是由于将超验世界经验化,这是当代文学的普遍顽疾。而何士光的修证实践系列散文提供了一个可资观摩借鉴的样本,为当代文学的终极关怀书写提供了新鲜的经验,这对于有心的写作者而言将是非常有价值的。

最后,何士光对生命归宿的终极叩问给人强烈的震撼,他的“以身试法”让人得窥生命的奥秘之一斑。在娱乐至死、金钱至上、舍本逐末的世俗化时代,何士光的写作聚焦心灵和精神,回到生命的本来与究竟,追求永恒与超越,将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很好地统一起来,如同喧嚣中的天籁、荒漠中的甘泉,不仅带来安慰,还如同那指向月亮的手,让人看到希望和出路。读者对他的信仰可以持保留态度,但并不妨碍以此为镜鉴省察自己,如论者所言,“传主信奉的净土法门我们可以不认同,但却不能认同无信仰的生活……另外他站在宗教立场上对现代性的核心观念——理性主义的批判,也能够纠正人们对工具理性的偏执,唤醒我们对审美人生的追求”^[8]。这个论断是恰如其分的。

参考文献:

- [1] 保罗·蒂利希. 系统神学(第1卷)[M].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1:14.
- [2] 张岱年. 中国哲学关于终极关怀的思考[J]. 社会科学战线,1993(1):95-97.
- [3] 何同彬. 往昔的德性与我们的命运:读何士光《今生——经受与寻找》有感[J]. 小说评论,2012(1):120-122.
- [4] 虚云法师. 复鼎湖山巽海上座[M]//净慧. 虚云和尚全集(第2册).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11.
- [5] 何士光. 城市与孩子[M]//田野·瓦檐和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1-11.
- [6] 何士光. 今生:经受与寻找[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
- [7] 何士光. 今生:吾谁与归[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
- [8] 杨学民. 为生命寻觅栖息之地:读何士光的自传《今生》[J]. 小说评论,2011(6):67-71.

- [9] 何士光. 今生:烦恼与菩提[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
- [10] 中国基督教协会. 创世纪[M]//圣经·中英对照(和合本). 南京: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07:56.
- [11]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9:152.
- [12] 德斯蒙德·图图.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M]. 江红,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69.
- [13] 赵朴初. 佛教常识问答[M]. 中国佛教协会,1983:26.
- [14] 柏拉图. 会饮篇[M]//柏拉图全集(第2卷).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27.

A model of writing on ultimate concer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On He Shiguang's series of essays on religious practices

YAO L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zhen Technology University, Shenzhen 518118, P. R. China)

Abstract: The absence of a transcendent dimension and the suspension of ultimate concern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onstitute a persistent and widespread malaise. This issue has been frequently pointed out by critics and deeply perceived by writers themselves. However, its manifestation in literary works often falls short of expectations and remains distant from readers' desires. Beyond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circumstances, the fundamental cause lies in the writers' inadequate philosophical penetration, which results in their lingering within the confines of empirical experience. This phenomenon is closely tied to the writers' selective engagement with intellectual resources. Their alienation from tradition and detachment from classical texts have led to weakened thinking capacities and a constricted vision. In contrast, He Shiguang stands out as a rare and remarkable exception. Through his profound immersion in Daoist and Buddhist traditions, accompanied by experiential cultivation, he has attained a vision of ultimate concern and transcendent wisdom. With these insights, he re-examines both his own life and the lives of others, producing a series of autobiographical essays that chronicle his spiritual and contemplative practices. These writings offer an alternative path for articulating ultimate concern with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lluminated by the principles and experiences derived from Daoism and Buddhism, his literary works exude both a sense of intimacy and a luminous wisdom. They not only provide solace amid worldly afflictions but also awaken a deep-seated yearning for the eternal. Whether in the examination of narrative motivations, the structuring of literary works and writing techniques, the introspection on personal life trajectories, or the systematic reflection on existence and the cosmos, all dimensions are situated within the coordinates of ultimate concern. Each element and detail is thus endowed with its rightful value and meaning. For instance, from this ultimate concern perspective, he offers novel interpretations of issues such as homosexual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uality and desire, and the critical readings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Consequently, these works are not only inspirational for literary creation but also provide profound spiritual comfort and intellectual enlightenment. Moreover, as a singular case, He Shiguang exemplifies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in an era marked by superficial reading. His work demonstrates both the efficacy of culture and the feasibility of engaging it in depth. Therefore, his series of contemplative essays contributes not only to literary creativity but also to the cultural renaissance and the remedying of contemporary maladies brought about by technocratic encroachment such as superficial reading habits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knowledge.

Key words: He Shiguang; ultimate concern; religious practices; religious literature

(责任编辑 周 沫)